

CHINA

中国发展道路研究丛书

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

CHINA'S RISE & WORLD ORDER

陈琪 刘丰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

CHINA'S RISE & WORLD ORDER

陈琪 刘丰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陈琪, 刘丰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7

(中国发展道路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2531 - 3

I. ①中… II. ①陈… ②刘… III. ①发展战略 - 研究 - 中国 ②国际政治 - 研究 IV. ①D61 ②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0902 号

· 中国发展道路研究丛书 ·

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

主 编 / 陈 琪 刘 丰

出 版 人 / 谢 寿 光

总 编 辑 / 邹 东 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139 责任编辑 / 段其刚 李 博 董风云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32.8

版 次 /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字 数 / 538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531 - 3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阎学通*

2001年起我与清华的同仁一起积极推动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化发展。在此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许多的困难，其中一个困难是，用科学研究方法做的实证研究成果难以找到刊物发表。在刚刚进入21世纪时，我国国际关系的刊物发表的文章原则上不超过8000字。然而，实证研究的社会科学论文很难局限在这个字数标准内。科学实证研究成果建立在对大量数据或详细案例分析的基础上，作者需要用大量的文字对数据和案例进行描述、分析和解释。有的青年学者甚至对我说，在中国从事科学实证研究无法生存，因为没有刊物发表这种文章。

为了推进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化，2004年我与陈琪同志商量，决定创办一份以发表科学实证研究文章为主的学术期刊，论文字数限制标准扩展至2.5万字。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工作，《国际政治科学》季刊终于在2005年春面世。自那时起，陈琪同志一直在第一线负责这本期刊的编辑工作，每月召集编辑工作会，讨论组稿、匿名评审问题，并进行文字修改和编辑。截至2011年夏，

* 阎学通，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国际政治科学》已出版了 26 期，带动了一批青年国际关系学者走上科学实证的研究道路。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凸显，全球范围的国际关系学界对于中国的研究热情得到极大提高。中国领导人对中国自身国际环境的变化作出了一个重要判断，即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合为一体。政策职能部门的判断是，我国自身的变化正在成为改变我国国际环境的最主要因素。中国学界对于研究中国对外政策或对外战略的热情迅速上升，研究中国外交思想的内容从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外交思想发展到中国古代国家间政治思想，研究中国外交战略的领域从政治、经济和安全拓展到文化和环境，研究中国外交的实践从中国外交到中国各不同历史时期的外交探索。

目前，世界上无论是亲华的还是反华的人士对于中国崛起已形成一些共识：一是中国崛起将是人类 21 世纪的头等大事；二是中国崛起将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三是中国崛起的特殊性将与以往大国崛起有所不同。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学者加强中国对外关系的科学实证研究，我们从以往历年《国际政治科学》发表的文章中，选取了有关中国与世界秩序相关的文章，集结成册，以飨读者。

本书分为“中国崛起的路径选择”、“中国与东亚秩序”、“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变革”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了中国崛起的路径和地位，第二部分讨论了中国政策对东亚秩序的影响，第三部分讨论了中国在世界秩序变革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我希望这个集子能给普通读者提供国际关系新知识，给国际关系实证研究的初学者提供模板，为资深学者提供理论参考，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启发性的思路。当然，我最希望的是，这个小册子能吸引更多学者从事国际关系的科学实证研究。

2011 年 5 月 23 日

于清华园新斋

导 论

陈 琪 刘 丰*

中国正在迅速崛起是国际政治中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势必改变既有的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秩序。不过，学术界对中国的崛起方式及其对国际体系产生的影响的想法充满争议。近年来，中外国际关系学界专门讨论中国崛起的相关著述的数量正以惊人速度增长，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超过大多数传统国际关系议题。总体而言，与中国崛起及其影响相关的讨论涉及诸多方面的问题：①中国崛起的速度、规模及其可能的趋势；②中国崛起的方式，包括崛起的中国如何界定自身的身份、利益，以及采取何种方式延续自身的崛起；③中国崛起给东亚地区秩序带来的变动；④中国在既有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及其对国际秩序变革的影响。这些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现存国际秩序的稳定、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重新定位以及主要大国的对华战略等重大问题。

自创刊以来，《国际政治科学》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的科学研究，刊登了大量与“中国崛起”及其对国际权力结构、地区安全局势以及全球秩序的影响等议题相关的论文。本书从中

* 陈琪，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刘丰，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精选出 19 篇论文，以“中国崛起的路径选择”、“中国与东亚秩序”和“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变革”三条主线加以编排，试图展示中外学者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提供的新视角、新理论与新方法，并且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可以拓展的基础。

—

在讨论中国崛起时，大家首先关注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已崛起成为强国，其崛起的速度、规模和强度究竟如何，中国到底是和平还是暴力的方式崛起，这些问题涉及中国崛起的路径选择问题。

为了相对准确地判断目前中国崛起所处的阶段和持续性，阎学通在《中国崛起的实力地位》一文中对中国崛起的速度、规模和强度进行了评估。针对以往定量评估中国综合国力方法中所存在的问题，该文采用等级评估法代替定量赋值法对 21 世纪初中国的实力地位进行了衡量。作者设定了政治、军事和经济三方面的等级标准，并依据这些标准对中国三方面的实力进行了分类等级评估。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综合实力已位居世界第二，具备了加快崛起的实力地位。作者认为，在中国自己不发生重大决策失误的前提下，2015 年中国将成为准超级大国。因此，中国可以考虑制定积极主动和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

在中国持续崛起的背景下，中国是以和平还是暴力的方式崛起，成为政界和学界高度关注的问题。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在《中国能和平崛起吗》一文中给出了并非绝对的肯定回答。他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可能的，同时也指出中国崛起面临的最为关键的制约在于，中国如何处理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问题以及如何面对与身边近邻的冲突和争议。从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观出发，布赞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提出了几点重要的政策建议，尤其是建设良好的国内社会，融入和促进国际社会的发展，以及

实现与地区其他大国的和解。

作为对布赞的英国学派视角的回应，秦亚青在《作为关系过程的国际社会：制度、身份与中国和平崛起》一文中运用中国的思维方式和哲学传统，提出了理解中国崛起的过程视角。作者认为，过程视角并不假定独立的实体和对立的类属是相互分离的，而是强调社会与社会中的行为体在不断运动的过程中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过程视角不认为两个对立物互不相容，通过互容式转化及交流对话，两个对立物可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合题。他指出，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逐渐从体系外国家变成体系内的重要新兴大国，其身份转变、制度选择和规范接受都是和平的，中国也一直坚持以和平方式处理和国际社会其他行为体的双边或多边关系。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西方一些学者关于中国会以暴力方式对抗国际社会、建立新制度的观点不足为信。

崛起是一个包含物质性意义和社会性意义的过程，既涉及物质权力的增长，也涉及社会地位的提升。王学东在《国家声誉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一文中力图论证，国家在崛起过程中追求国际声誉可以缓解崛起过程中面临的结构性压力。作者认为，国际行为能够表达意图，而国际声誉是对国家意图进行判断的依据，国家依据一国声誉预测其未来行为。在单极体系中，崛起中的国家承受着巨大的结构性压力，为了避免受到遏制，崛起国可通过建构良好声誉的方法积极显示自身意图。通过对冷战期间和冷战后中国国际战略环境的比较，作者分析了冷战后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对建构国际声誉的效果。当然，他也强调了国际声誉的提升只能缓解而非根除结构性压力。

一些学者试图从中国的战略文化判断中国崛起的路径选择，将其作为分析和预测中国对外政策取向的重要依据。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江忆恩（Iain Johnston）提出“中国战略文化是进攻性文化”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文化上的理论依据。在美国任教的冯惠云撰写的《防御性的中国战

略文化》一文同样考察的是中国战略文化的性质，但得出的结论与江忆恩完全不同。借鉴了政治心理学的行为代码分析，即以决策人的公开讲话为研究对象，通过计算机对文本中动词进行量化分析与对比，分析和预测决策人的战略文化取向，作者对中国现代战争中领导人的心理决策过程进行了扎实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中国战略文化是防御性文化的判断。

二

中国是一个地处东亚地区的大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的重心主要是在这一地区。与此同时，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影响及变化首先也会为地区内国家所认识和感知。中国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塑造变动中的东亚秩序，直接关系中国崛起的成败。

冷战后中国的周边外交活动非常活跃，开始越来越多地参加各种区域多边合作制度。但是，中国对不同的区域多边安全合作制度的参与和支持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中国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动因》一文中，韩国学者姜宅九对中国参与区域多边安全制度的动因和差异进行了细致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他认为，中国对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支持态度取决于利益目标，而中国对区域多边组织制度的参与态度则取决于安全威胁的程度。在面临传统安全威胁时，中国选择慎重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当在制度内只能维持既有利益或无法主导该组织时，中国采取稳健支持态度；当认识到多边安全合作制度既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处，也可以约束对方的行为时，中国则积极参加地区多边安全合作。作者进而预测，中国参与东亚峰会等地区多边合作进程的总体趋势并非呈现“螺旋上升”，而是慎重参与、稳健支持。

在中国参与的地区安全机制中，上海合作组织是由中国倡导建立的、以全面多边合作为最大特点的地区组织。这一组织缘起

于从 1989 年中苏边界谈判开始的“上海五国机制”，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逐渐发展为一个多层次、多领域的多边合作体制。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形成及其动因》一文中，林珉璟和刘江永对上海合作组织转变为一个全面安全合作组织的原因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信任的形成、主导国的推动和共同安全利益的深化，是解释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进程的三个动因。在边界谈判时期，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中国与哈、吉、塔等国形成重要互信。这两种信任关系成为以后产生中俄合作以及使中亚国家加入中俄主导的安全合作组织的基础。中俄逐渐建立的信任关系催生了合作产生的第二个动因，即中俄主导。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变得明显，上海五国提出多边合作并发展成安全会议机制。1998 ~ 2001 年，共同和互补的安全利益更加深化，从而推动上海五国提升为上海合作组织。作者也指出，中国出于维护良好的周边环境、保持地区稳定和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需要，将会继续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

除了参与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中国也是东亚地区一体化的重要力量，尤其是与地区内中小国家结成的地区性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之间形成了长期的良性互动。研究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学者普遍认识到，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明显快于日本与东盟关系的发展。王莉欢在《冷战后中、日与东盟的关系》一文中对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考察。她发现，美苏两极格局的消失可以解释为何中国—东盟政治关系能在 1996 年赶上日本—东盟政治关系。但是，结构性原因不能对中国与东盟关系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而日本与东盟关系则缺乏前进的动力做出比较完整的解释。作者认为，中国与东盟区域化政策一致，而日本与东盟区域化政策不一致，是导致这一时期中、日与东盟关系发展一快一慢的重要原因。1997 年以来，中国和东盟的区域化政策接近使得中国与东盟关系快速扩展并得以深化。中国选择与东盟一致的区域化政策主要源自战略考虑，

力图缓解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同时不愿看到危机后的东盟继续弱化，失去其独立自主能力而最终倒向美国。日本的区域化政策同东盟的区域化政策不一致，主要原因是日本奉行以美国为中心的对外战略，无法在美国和东亚（或亚洲）之间做出选择。东盟积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的主要动力是，希望把东南亚经济整合到东北亚经济中去，防止东盟边缘化。

中国与东盟之间一个重大的开放和合作举措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正式生效。自贸区的建成不仅将巩固和加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和东盟各自的经济发展，扩大双方贸易和合作规模，提高本地区的整体竞争能力。不过，东盟国家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过程中对相关安排的顾虑和争议也从没有消失过。在《东盟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顾虑》一文中，陈琪、周舟和唐棠等对东盟国家产生顾虑的原因以及如何缓解这种顾虑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东盟国家在政治和战略上的不安全感加剧了其对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顾虑，因而在自贸区建设的不同阶段采取了各种防御性举措。作者也提出，在东盟国家对自贸区协定和中国经济影响力增长持有各种顾虑的情况下，中国需要通过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变增长方式，从而最终成为区域消费中心，由此才能应对东亚地区增强的对华制衡趋势，推动自贸区作为稳定中国—东盟关系的联系纽带和合作平台的发展。

在中国崛起的同时，近邻印度也在迅速崛起，印度对中国周边安全局势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司乐如（Lora Saalman）在《印度学者对中国的安全认知》一文中考察了印度学者对中国的安全认知。作者认为，“一轨”外交和“二轨”外交都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值得重视的内容，前者有助于说明两国在政府外交层面的表现，对后者的研究则有助于了解在外交现象背后起作用的观念因素。作者在研究中将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些核心概念融入国际关系的研究之中，通过提供关于“认知”的更为精确的概念和理论框架，

并通过术语统计和定性的案例分析，深入印度专家的视角，深化了人们对中印安全互动的了解。

李莉在《冷战后印度的安全观及对华政策》一文中同样关注的是印度对中国的安全认知和政策。不过，与司乐如侧重印度学者的视角不同，该文试图回答的是，印度政府的安全观念的变化及其导致的对华政策调整。作者认为，以1998年试爆核武器为界，印度安全观念出现两个阶段的变化，其对华政策也经历了先强硬后缓和的转折。在冷战结束至1998年之前，印度认为军事威胁紧迫性下降，更加重视经济实力，坚持自主安全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相应地，印度不再视中国为敌人，并且有意识地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经验，在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上减少对抗。1999年之后，印度确认了自己核国家的身份，认为崛起的战略机遇已到来，提出了综合安全的观念，把对话与合作看做维护安全的重要手段。与之相应，印度重视维持中印关系的稳定，加大对华经济合作的力度，并发展与中国的军事交流。当然，作者也指出，印度依然保持重视领土安全和均势策略的传统，在对华政策上仍然重视边界问题并寻求大国关系的平衡，其对华政策具有两面性。

中国学者近年来更加注重挖掘中国历史经验对当前东亚秩序建构的启示，“朝贡体系”就是这些历史经验中最受重视的部分。张锋在《解构朝贡体系》一文中对朝贡体系这一概念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指出了费正清提出的“东亚朝贡体系”在假设、逻辑和诠释范围等方面的缺陷。作者建议从两个层次对朝贡体系进行解构：一个层次是将其看做对中国中心论和优越论的一种帝国话语叙述；另一层次是将其看做中国与其邻邦之间关系的互动形态。对朝贡体系的研究，需要构建一个框架来同时解释帝国话语叙述的稳定性和中外互动形态的变动性。

周方银在《朝贡体系的均衡分析》一文中则试图探讨朝贡体系具有稳定性的原因。作者认为，朝贡体制作为一种制度架构的

存在，有赖于对外思想观念、对外政策的具体运作以及在其背后的战略、策略考虑等多方面因素的支撑。朝贡体制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一种观念上的存在，而且表现为一定的外在政策。朝贡体系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跨越几千年的历史时期而存在，不仅是一种观念上的延续，也是一种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延续，其在战略和政策层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上，作者从博弈均衡的角度对朝贡体制进行了分析。

三

冷战结束之后，中国逐渐从国际体系的革命者转变为现有国际体系的渐进改革者甚至是积极维护者，主要体现在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全面接受和参与。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西方许多学者怀疑实力强大的中国必将成为改变现状的国家，挑战现行国际秩序，尤其是与美国发生冲突，改变美国缔造和主导的国际规则。这些判断是否准确？第三部分的六篇文章分别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

从传统的权力转移理论看，崛起国带来的权力变更很可能会导致国际冲突。不过，罗纳德·塔门（Ronald L. Tammen）和亚采克·库格勒（Jacek Kugler）在《权力转移与中美冲突》一文中对传统的权力转移理论进行了修正。他们认为，国际权力转移增加了战争冲突的几率，但是否一定爆发全球性对抗还取决于崛起国的现状偏好程度。两位作者估计，中国将在21世纪20~30年代实现与美国的权力持平，因而双方存在冲突的可能性。但从中美间的领土争端、军备扩张、对待现行国际规则的态度、意识形态争论和经贸合作五个方面进行考察，可以得出中国是对现状满意的国家的结论，所以短期内中美不但不会产生冲突，而且有实现合作的独特机会。作者指出，中美双方应该利用这个短暂的机遇，尽快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否则可能留下冲突的隐患。

学术界一直就中国是维持现状国还是改变现状国展开争论，为

了解决这种争论，江忆恩在《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一文中以中国对国际制度的参与为指标，分析了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政策立场。作者在研究中提出了测量一国对国际秩序态度的五项标准，分别是参加制约主权国行为的国际机构的情况、在这些国际机构内的违规行为、改变这些国际机构规则的行为、对国际权力再分配的偏好及实现权力再分配的目标。根据这些指标对中国的实际对外政策和国际行为进行检验，作者的研究结论是，中国并没有采取改变国际秩序现状的实际政策，不能断言中国是一个改变现状国。

孙学峰的《中国对美政策的战略效应》一文试图回答中国采取何种策略能较为有效地应对美国战略压力的问题。作者比较了中国对美采取的战略安抚政策、战略强制政策和经济诱导政策的不同效果，发现战略安抚政策缓解安全压力的效果不明显，但能减轻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对美经济诱导政策化解经济压力及相关政治矛盾的效果显著。作者认为，这些不同战略政策导致不同效果的主要原因是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以及中国相对实力的提升。因此，中国可在其他问题上贯彻合作为主的对美策略，但无法寄希望于以战略安抚换取美国在中国至关重要的安全问题上的合作。

一般认为，冷战后中国对美国并未采取典型的制衡政策，不过学术界对于冷战后中国是否对美国采取了“软制衡”政策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通过考察冷战后中国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投票情况，戴颖和邢悦的论文《中国未在联合国对美国软制衡》对两种主要观点进行了实证检验。作者发现，冷战后在中美两国安全领域共同利益下降、中国存在制衡美国必要性的情况下，中国并没有利用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机制来阻止、反对美国相关政策的实施。作者认为，冷战后中国只在涉及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会动用安理会的否决权；而在其他问题上，即使美国的扩张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中国仍然倾向于投弃权票与之合作，其原因在于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一直坚持“韬光养晦”政策，并且将中美关系置于超乎寻常的重要地位。

在《反美和亲中相关吗》一文中，杨子潇和崔大伟基于皮尤调查中心 2005 年春季在全球 16 个主要国家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使用定量研究方法探讨世界民众对美国和对中国看法之间的关系。文章首先根据民调中对中国经济崛起和军事崛起的两个问题，将所有受访者划分为亲、疏、经济支持、军事支持四个类型。数据显示，世界民众大多对中国的经济崛起呈正面评价，而对军事崛起呈负面评价。另外，这四种类型之间的界线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地理界线也有很大重合之处。最后，反美和亲中是否相关取决于中国以何种身份出现：当中国被视为经济崛起国时，越亲美的受访者越对中国有好感；当中国被视为军事崛起国时，越反美的受访者越对中国有好感；当中国被直接视为一个整体概念时，越亲美的受访者越亲中。这一发现说明，中美两国的国家形象重合之处大于冲突之处。

中国是既有国际规范的接受者还是渐进改革者？在《国际领导与国际规范的演化》一文中，阎学通借鉴中国先秦“王、霸、强”的概念，论证了世界主导国的王、霸、强三种性质与道义规范、双重标准规范和实力规范之间的对应关系。作者认为，主导国的性质决定了国际规范的演化方向，而其自身行为是影响国际规范演化的主要路径。既有研究多从主导国塑造新国际规范的策略角度进行路径分析，本文则根据弱者效仿强者这一普遍社会规律，分析了世界强国自身行为在国际规范演化中的样板作用。依据世界主导国的性质变化无既定方向的历史现象，作者推演出了国际规范演化无既定方向的结论。不过从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出发，作者仍然为未来的国际规范演化进行了预测，认为今后 15 年国际规范仍将依据美国的性质演化，而在 2025 ~ 2050 年，国际规范的演化将主要受中国的性质影响。

四

本书的各篇文章所讨论的问题涉及与“中国崛起”这一话题相

关的既有研究中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内容。从本书收录的文章以及近期国内学术界的相关讨论来看，中国学者对中国崛起的路径选择及其对东亚乃至全球秩序的影响，已经形成了可喜的视角多样的研究，既对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做出了扩展和修正，也对中国外交政策实践提出了反思和建议。未来，随着中国实力的持续提升，国际格局以及相应的国际秩序还将发生深刻的变化。现实的发展也将为学术研究提出新的问题。在此，我们从本书涉及的三个主题提出几点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希望引起学界同仁的重视。

第一，中国崛起的内部基础及其持续能力。大国的兴盛与衰落根本而言是源于内部的动力，其中重要的要素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卓越的创新能力和坚韧的国民性格以及持续的内部增长等。如果我们承认实力仍然是国际政治经济中的核心内容，是实现国家目标的基本手段，那么可以肯定，其他国家只有保持崛起的强劲内在动力，继续维持甚至提升崛起的速度与规模，才可能与美国进行持续的竞争。否则，只可能像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其他对美国地位构成挑战的国家（如苏联、西欧、日本）一样，尽管一度有赶超美国的趋势，但都未能改变力量对比向美国有利的一方大大倾斜的格局。一个国家的持续崛起，必然伴随着内部组织的创新与变革，通过这种制度的变革，改变增长方式，从而加速追赶的进程。所以，中国的崛起关键在于不断改革优化国家内部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使国家实力的持续提升获得强有力的内部支撑。

第二，中国周边战略转变的方向及其对东亚秩序的塑造。在过去 20 多年间，出于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的需要，中国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实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对周边国家在经济和安全上分别采取了分享机遇和自我克制的策略，一方面依靠经济手段为这些国家提供稳定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在与自身核心利益直接相关的安全问题上进行战略安抚。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以往的周边政策的重心实际上在于“富邻”，希望以互惠甚至让利的方式换取周边

国家在战略和政治上对中国崛起的信任。尽管我们在安全领域也采取了自我克制的策略，搁置与周边国家在安全问题上的争议，但这种策略是稳定安全预期的一种消极手段，必须以其他国家给予积极和善意的回应为条件。如果无法得到善意回应，将使自身在这些问题上的核心利益遭受损害，并且丧失解决问题的主动性。目前的困境在于，许多周边国家在深化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的同时，也在不断强化与美国之间的安全互动。如果要真正达到维护自身和地区安全、缓解东亚其他国家安全忧虑的效果，中国在进一步提供经济收益的同时，在政治和军事上也需要采取积极的安全保障措施，尽量避免美国拉拢周边国家结成针对中国的同盟，积极发挥中国自身在塑造地区内经济和安全秩序中的主导作用。面对这一困境，中国学者需要探讨如何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塑造东亚秩序的新基础。

第三，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公益供给与国际规范的转型。国际政治实践表明，实力和影响力是主导国权力的两个支柱，无论一个大国是否具有争夺霸权的欲望，都要在实力积累的同时建设自身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国家在从崛起国转换为主导国的过程中，都需要为国际社会提供足够的公益，维护国际社会的基本规范，以塑造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正当性。在无法达到物质实力的平衡之前，主要大国也可以利用霸权国正当性下降的机会提升自身的影响力。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的影响力建设可以在提供国际公益和秉持国际道义两方面加强力度：一方面，中国可以提供与国家实力地位相匹配的国际公益，维持国际秩序的正常运转，保证地区稳定与和平；另一方面，中国仍然需要保持维护国际正义的道义责任和原则立场，维护国际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和理论研究提供了历史机遇，期待中国国际关系学人在既有研究基础上继续为中国崛起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持和可行的政策建议，与国际学界分享“中国经验”和“中国视角”，在国家崛起的同时实现思想和学术的崛起。